

## “天下”與“家國” ——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

劉茜

**[摘要]** 晚清以降，隨着西力的衝擊，晚清社會發展被打亂，西風東漸，更是深深影響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在當時中國社會的複雜景象中，鄭觀應在詩歌創作中表達了他對近代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國族意識的重構、國家體制的改革等問題的深入思考，並“以議論為詩，直紀時事”的創作主張延續了古典詩歌的“詩史”精神，詩歌中蘊含了高度的史料價值，為研究晚清思想，採用“詩史互證”這一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行性。

**[關鍵詞]** 世界萬國 詩史 詩歌 國族意識 鄭觀應

被譽為“實業詩人第一家”的鄭觀應，<sup>①</sup>可以說是晚清士人中商儒兼業、中西兼學的成功人士，也是晚清“開眼看世界”的有志文人的代表。鄭觀應的一生與中國最為動蕩不安的時代疊合在一起，作為晚清的實業家、維新改良的啟蒙思想家，他對社會改良的設想是從他對洋務運動的實踐出發的，更具有實用意義與參考價值，他在《盛世危言》與《易言》等著作中表達出的務實求真的思想，與“審時度勢”的獨到思考與見解，對當世及後世都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作為一名詩人，他的詩歌創作也是蔚然可觀，其詩作數量遠超同時代的其他詩人，分別見於《羅浮侍鶴山人詩草》、《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羅浮侍鶴山房談玄詩草》等，共計詩歌1,180餘首。學界對鄭觀應詩歌的研究始於20世紀60年代，曹思彬曾發表《鄭觀應的反美詩歌》，<sup>②</sup>啟發了學者們從鄭觀應詩歌領域瞭解其思想的研究路徑。90年代以後，鄧景濱較全面地闡述了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先後發表了〈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sup>③</sup>〈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sup>④</sup>但是，作為鄭觀應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版塊，學者所給予的關注度還是稍顯薄弱，學界關於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出發，從其內容體系上考量鄭觀應詩歌與社會、感情、形式、語言的關係，對詩作中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實業詩，進行內容與價值的分析與總結；<sup>⑤</sup>二是從詩歌藝術理論的角度對鄭觀應的詩歌進行評價。

**作者簡介：**劉茜，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生，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講師。

<sup>①</sup>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上、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1、2期（1999）。

<sup>②</sup>曹思彬：〈鄭觀應的反美詩歌〉，《南方日報》（廣州），1964年5月16日。

<sup>③</sup>鄧景濱：〈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嶺南文史》（廣州），第2期（1995）。

<sup>④</sup>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上、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1、2期（1999）。

<sup>⑤</sup>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2期（1999）。

而將鄭觀應的詩歌與晚清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嬗變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的方式還較為少見。因此，本文將鄭觀應詩歌置放於晚清知識分子對“國家定位”與“國族意識”的觀念下予以考察，並說明其詩歌創作中對傳統詩歌“詩史”精神的延續。

## 一、從“天下一國”到“世界萬國”的重新認知

《詩經·小雅·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即是天下”的意識根深蒂固。直到明末清初，一批西方傳教士帶來了自西方“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世界地理知識與西方的史地著作，第一次對“中國即是天下”的觀念形成了強而有力的衝擊。雖然，國人逐步接受了“中國僅僅是大東方的一部分”，<sup>①</sup>把“西洋諸國”納入到“天下”的概念中，但是卻形成了以“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層級結構觀念，在這一世界層級圖景中，西洋諸國被國人置於“藩屬”、“化外”的層級結構中。明末來華的利瑪竇曾這樣概括當時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他們看來，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sup>②</sup>發生於18世紀末的“觀禮之爭”，是中國依然以國為“天朝上國”、君為“天下共主”觀念的證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謁見乾隆皇帝，英方使臣拒絕了清政府要求其與以往來華的葡、荷使臣一樣，須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在激烈的爭執之後，最終英使臣以“三跪九俯首”的變通方式，基本順從了清方的要求。當時清朝官紳作詩有云：“獻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儀野鹿腔。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sup>③</sup>詩中所述“遐邦”來謁見乾隆皇帝時所表現的“生梗朝儀”，是不得體、野蠻的表現，但由於皇帝“天威”的震懾，遐邦使臣“齊膝跪地”臣服於天朝上國，最終還是彰顯了皇帝“天下共主”的威嚴。外國使團的“恭順”表現，加重了清朝官紳保守的“天下”觀念，以致於繼續停滯在天朝大國和朝貢體制的幻夢之中，使之既不屑於去瞭解中國之外的世界，當然也更不利於瞭解自己。

然而，世界不會因為清人的裹足不前而停滯。當時的清人由於以“天下一國”觀念為基礎，對世界的認知模糊不清，導致鴉片戰爭使清廷上下從軍事到思想都措手不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批率先接觸到西方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對西方列強的深入觀察，以及對國與國關係的冷靜思考。

鄭觀應與同時代的晚清士人一樣，被迫裹挾在時代的巨變之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

<sup>①</sup>（意）利瑪竇（Matteo Ricci）；（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79。

<sup>②</sup>（意）利瑪竇（Matteo Ricci）；（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81。

<sup>③</sup>〈癸丑仲夏扈蹕避暑山莊恭紀〉，轉引自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觀禮之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8本第1分冊（2007），頁56。

法戰爭、中日甲午海戰、八國聯軍入侵，每一次侵略都給國家帶來巨創。中國新舊秩序、新舊價值觀念交替碰撞，都衝擊着這一時代的士人們。鄭觀應沒有走科舉考試之路，而是到上海學習經商，在上海洋行學做買辦時接觸到了西方，受到各類報紙的啟發，並且相當留心閱讀西學書籍。對近代資本主義有親身體驗的鄭觀應，用戰國七雄比附當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方今俄與英、美、普、法、奧、日諸國，爭逐海上，何殊戰國七雄。”<sup>①</sup>在鄭觀應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著述中，顛覆了一直以來國人五洲一統、華夏中心的論調，破除了清人“天朝上國”的虛妄觀念，從傳統的“中國即是天下”的概念逐漸過渡到中國是天下萬國中的一國。他在〈論公法〉一文中說：“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而不能相統屬者也。”<sup>②</sup>明確指出當時的世界已是“萬國林立”的態勢。誠然，鄭觀應描述的“萬國之大和”是一種理想狀態，在商界馳騁多年的鄭觀應以其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後續的詩作中，不斷表達了中國被列強覬覦的危機意識。可貴的是，鄭觀應持續觀察到西方列強鯨吞中國的野心，認為對西方列強中“防俄宜先”，對沙俄的認識有一個持續性觀察的過程。

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前，鄭觀應就已經洞察到沙俄企圖擴張的野心，他在〈論邊防〉中說：“俄則地據形勝，兵嚴紀律，惟以開疆拓土為心，向為諸國所忌，而尤為中華之所患。”<sup>③</sup>並贊同 1850 年林則徐對俄羅斯的看法，即“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也”。<sup>④</sup>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宮廷西逃，他在〈拳匪〉一詩中不僅揭露了八國聯軍的侵略暴行，還在詩中特別指出沙俄“兵最凶”、“更奇詭”：

俄德兵最凶，殺人如犬豕。淫姦復槍斃，婦孺全慘死。京津遭毒炮，屋宇成棘枳。  
玉石誰為分，蘭艾同時毀。春秋救鄰國，大義豈如此。列邦各懷私，強秦更奇詭。<sup>⑤</sup>

又在〈書東三省俄兵暴虐事〉中，以敘事的方式記錄了鄰國帝俄“心狠若豺狼”，完全不講大義，在東北“佔官署”、“毀民房”、“驅人下河海”所犯下的一系列暴虐事件：

俄志圖北省，法欲據南方。昔創興亞會，兩國頗驚惶。……動輒肆陰謀，違恤背盟章。所謀如弗遂，壓以兵力強。朝廷惟忍辱，日月暗無光。驅人下河海，視我如犬羊。兵來佔官署，兵去毀民房。暴虐竟如此，何時天罰彰。<sup>⑥</sup>

鄭觀應不僅很早就看出了沙俄侵略的危害性，並能夠對北方局勢進行準確的判斷。當侵略

<sup>①</sup> [清]鄭觀應：〈論公法〉，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6。

<sup>②</sup> 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4。

<sup>③</sup> [清]鄭觀應：〈論邊防〉，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14。

<sup>④</sup> 轉引自馮玉軍：〈俄國之於中國的意義與俄蘇問題研究方法〉，《國際論壇》（北京），第6期（2021）。

<sup>⑤</sup> [清]鄭觀應：〈書東三省俄兵暴虐事〉，《羅浮倚鶴山人詩草》卷二，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25。

<sup>⑥</sup> [清]鄭觀應：〈書東三省俄兵暴虐事〉，《羅浮倚鶴山人詩草》卷二，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33。

聯軍佔領北京，沙俄卻趁機侵擾中國東北三省，他在〈閩東三省俄國鐵路章程〉詩中說：

外人入內地，築路造兵房。托詞防盜賊，保護各行商。大權操自彼，視我若犬羊。  
各省恐如是，先籌抵禦方。<sup>①</sup>

在〈贈日本伊藤侯相三十六韻〉中，又進一步揭露帝俄“得隴望蜀”，企圖“包舉如卷席”的狼子野心，同時由於清政府的軟弱，引得其他列強也紛紛效尤：

痛哉列國議瓜分，虎視眈眈伺我隙。俄人陰謀更恣肆，直欲包舉如卷席。非特得隴還望蜀，不啻假途先滅虢。各國紛紛竟效尤，要求不得肆恫嚇。<sup>②</sup>

正是由於鄭觀應能夠準確地洞見時局，並給予準確的判斷，他清楚地看到“群雄各覬覦，利權暗侵奪。俄德窺北轅，法日界南轍。英復圖中央，圍棋布子密”（〈與西客談時事志感〉），<sup>③</sup>同時期望能夠鞭策世人，警醒國人。

在擺脫了中國中心論的蒙昧認知以後，如何將自己在世界體系中重新定位，是又一個困難的命題。從鴉片戰爭開始，國人需要從“中國即是天下”的概念，扭轉到把遙遠的西洋諸國接納為天下的一部分，再到被傳統觀念中的“藩屬”之地的西洋諸國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前後短短幾十餘載，國人必須審視自我，重新定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華文明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

鄭觀應在這一歷史觀念的變動過程中，對中國的重新定位表達在他所作的〈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中日在滬共設各種書院〉一詩中：

亞洲各國人，泥古不知變。貴邦首維新，富強今已見。……歐土亦凡民，才豈過亞人。惟自強不息，故月勝日新。<sup>④</sup>

詩中所述之“亞洲”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區域，還是一個歷史文化空間，雖然這個歷史文化空間是以中華文化為中心，但鄭觀應已將這種華夷觀念瓦解，並認識到曾被中國視為蠻夷之地的日本已悄然崛起，明治維新所帶來的巨大成功使日本走上富強、工業化的道路。在他的詩作中說“轉弱為強觀日本，因時變法效西歐”（〈列國興革大勢歌〉），<sup>⑤</sup>充分表達了對維新求變的渴盼。在晚清思想中，康有為在1898〈日本變政考〉中也有同類表述，

<sup>①</sup>[清]鄭觀應：〈閩東三省俄兵俄國鐵路章程〉，《羅浮倚鶴山人詩草》卷二，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35。

<sup>②</sup>[清]鄭觀應：〈贈日本伊藤侯相三十六韻〉，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52。

<sup>③</sup>[清]鄭觀應：〈與西客談時事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95。

<sup>④</sup>[清]鄭觀應：〈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中日在滬共設各種書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38。

<sup>⑤</sup>[清]鄭觀應：〈列國興革大勢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361。

這也是晚清進步知識分子懵懂的共識。

此外，詩中所出現的“亞洲”、“亞人”等表述則體現了鄭觀應的“泛亞細亞思想”，以促進東亞各國的團結，雖然有關“泛亞思想”的言說背後，中、日有不同的理念和主張，但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種“泛亞細亞思想”無疑是重新建構了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具有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對外反抗西方霸權的意義。<sup>①</sup>這種泛亞細亞思想在晚清至民初時期的康有為、孫中山的思想中亦都有所體現。

同時，鄭觀應能夠以其他弱小國家為鏡，居安思危，這種同病相憐的憂患意識是晚清近代中國民族意識開始嬗變中的重要一環。在〈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一詩中，鄭觀應滿懷憂心地寫道：

俯仰天地察人國，消長存亡理可測。環聚星斗成天球，匯合山海為地域。……我  
讀波蘭戰史篇，每為掩卷長歎息。治亂休戚漠不關，馴至兩雄相僭逼。<sup>②</sup>

波蘭在18世紀以前曾被“兩雄”——俄、普——肢解，釀成亡國的悲劇，鄭觀應讀波蘭戰史後究其原因，概括在詩中是由於波蘭政府“治亂休戚漠不關”的麻木所致，這與當時清政府的境遇何其相似，彼時的中國被群雄虎視，西方列強“紛索租界歸自治”，<sup>③</sup>中國已成為被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而當局者卻苟且偷安、妥協求和，政府的軟弱使鄭觀應扼腕拊髀。

鄭觀應以他親身體驗與深入觀察掙脫了中國中心論的思想桎梏，從天下格局中的“天朝”，扭轉為世界格局中的“中國”，清醒地看出中國不僅不是世界的中心，反倒是被孤立，被列強覬覦的危機態勢。在他的詩歌中表達了他的“救國苦心”，面對這樣的局面，他甚至發出了“關懷大局危如許，痛哭陳書淚不禁”（〈乙未感事〉）的萬分無奈之句。<sup>④</sup>

## 二、從“族群意識”上升到“國族意識”

“族群意識”在中國古代就已出現，如華夏之於夷狄，漢人之於匈奴人，唐人之於突厥人，宋人之於契丹人、女真人，明人之於滿人。分辨“我族”與“非我族”，實際是建立了一種“自我”與“他者”族群之間的藩籬。這種“族群意識”來自於氏族或種族觀念，最開始界定族群邊界的依據是血緣。在封建國家形成以後，王朝作為主要政治組織單位出現了，族群意識雖然增加了政治的新內涵，開始從血緣擴及地緣，但是血緣世襲的王朝政治也遮蔽了人們的國家觀念。<sup>⑤</sup>因此，從先秦至清的兩千餘年中，中國的族群意識依附於王朝政治，這種

<sup>①</sup>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台大歷史學報》（台北），總第30期（2002）。

<sup>②</sup>[清]鄭觀應：〈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50。

<sup>③</sup>[清]鄭觀應：〈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50。

<sup>④</sup>[清]鄭觀應：〈乙未感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0—1361。

<sup>⑤</sup>郝時遠：〈先秦文獻中的“族”與“族類”觀〉，《民族研究》（北京），第2期（2004），頁36—46。

以血緣為基礎，糅合儒家禮制文化的“族群意識”，還不能稱之為現代的“國族意識”。

甲午戰敗後，“天朝大國”的觀念已經幻滅，晚清士人普遍具有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企盼維新、提倡富強改良的思想言論日漸鼎沸。受現代國家觀念影響的改良階層瞭解到，挽救國家危亡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維新改良，還需要加強普通民眾的族群意識，凝聚為團結抵抗外辱的合力。中國在19世紀由改良派發起的“自強”、“洋務”等運動，對西學的興趣、海外留學的潮流、太平天國運動等，都具有深刻改造既有社會體系，以及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含義。重構國族，包括改造國家體制和動員個體對國家的歸屬，把過去以王朝為國家的意識，轉變為以國家與民族為一體的國族意識，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國族思想中高度融合。<sup>①</sup>因此，甲午戰敗後浮現出的“國族意識”，是一個“地緣——文化——政治”的結合體，其核心就在於以國家為單位，內結外競，競存於世界。<sup>②</sup>

在“國族意識”產生，國家觀念逐漸強化的歷史背景下，首先需要喚起的是已經淪陷於西方列強統治下本土國民的救國使命感，晚清進步士人在他們的著述中逐漸體現出重國家社會、輕種族矛盾的歷史書寫方式，以此構建出國民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同。

概覽鄭觀應的詩歌創作，亦有不少以促進國族整合為目的，喚起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詩作。在〈憤世〉一詩中，強調了漢人與滿人，以及生活在華夏大地的其他族群，都應該有唇齒相依、相互依存的情感，寄望於中國的同胞能夠團結一心，共赴國難：

群雄似虎狼，暴虐無倫理。驅我作牛馬，反笑不知恥。普告漢滿人，相依如唇齒。  
憤志學東鄰，愛國同生死。<sup>③</sup>

針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美國、夏威夷、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的排華事件，鄭觀應又作〈哀黃人〉一詩：

天地有正色，建中皇立極。黃人居中原，世為天下則。……焚殺似兇狼，災禍生不測。苛禁我黃人，不容屢彼國。……黃人居外洋，異族招忌克。定讞歸洋官，罪名任羅織。<sup>④</sup>

在鄭觀應的詩篇中，無論是“普告滿漢人”，又或是“黃人”等言說，其內涵都不是狹隘的“華夏”、“漢族”之類的定義，而是以國家觀念為定位的大民族。

近代國族意識的產生也促使人們開始關注曾被明清政府視為“棄民”的海外華人的境遇。明清兩代長時間的海禁政策，那些前往南洋等地的華人曾被朝廷視為“棄民”，直到1840

<sup>①</sup>趙軼峰：〈國族重構與中國現代歷史學〉，《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5期（2019），頁49—60。

<sup>②</sup>姜萌：《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中國現代歷史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01。

<sup>③</sup>[清]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2。

<sup>④</sup>轉引自管林、陳永標、王松濤、謝飄雲、左鵬軍、閔定慶：《嶺南晚清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07。

年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在列國的相互競爭中，海外華僑華人是一支可依靠的力量，海外華人群體成為了與各國進行博弈的戰略資源。加之中國士紳階層的國家觀念日漸萌發、強化，清政府不再將出洋華民視為“叛民”和“棄民”。<sup>①</sup>1883年鄭觀應首次使用了“華僑”一詞來稱呼在國外客居的國人，從此也成為對僑居海外華人的專稱。<sup>②</sup>“華僑”一詞逐漸與“華人”這一族裔相聯繫，泛指本土以外具有中國人血統並一定程度保留中華文化的人。從“逃民”、“罪民”到“唐人”、“華人”再到“華僑”，客居海外的中國人終於在身份和處境上得到了政府與主流階層的認同。

鄭觀應心繫海外華人的境遇起伏，對華工出洋的問題頗為關心。他曾因洋務遊歷南洋多國，在接觸了客居海外的華人群體後，對華人在南洋被外國人欺凌的事件感同身受，並向李鴻章報告了華人的遭遇，力促官方給予關注與保護。特別是在晚清時期，沿海地區出洋務工的人數日益增多，其中一些華人是以“豬仔”的身份被販賣出去的，鄭觀應對販人為奴之事，深惡痛絕，從同治元年（1862）起就不斷收集資料，在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的《救時揭要》中創作了一系列有關華工的文章如〈澳門豬仔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救豬仔巧報〉、〈記豬仔逃回訴苦略〉等“觸景傷情，略陳利弊”之作。在《易言》（1880）、《盛世危言》（1894）中都有〈販奴〉一文，揭露了沿海地區販人為奴之事：“其（指華人敗類）與洋人溝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誘以貲財，或誘以游博，一吞其餌，即入牢籠，被拘出洋，不能自主。”<sup>③</sup>

鄭觀應除了在著述中抨擊華人被販為奴，在詩歌中也描述了華人在外遭受到的欺辱與無助的境遇，在〈南洋〉一詩中寫道：“愁聽華商無保護，任人凌辱復如何！”<sup>④</sup>在〈南遊同感〉一詩中云：“般鳥客貨稀，呂西例最酷。人店皆抽稅，華民同奴僕。欺吾無領事，弱為強之肉。愿睹漢官儀，藉以保宗族。”<sup>⑤</sup>在〈書抵制美國禁華人入口〉一詩中寫道：“華人出外洋，政府無保恤。勞苦得工資，竟為土人嫉。譏我如野蠻，作工不守律。……”<sup>⑥</sup>除了表達憤慨之情，還主張政府出面保護海外華工、華商的權益。

鄭觀應希望政府能對出洋的華工通過各種外交手段加以保護，並指出拐賣華人過洋不僅害民，而且害國。這種重民、愛民的思想，雖然是以儒家民本論為基礎的，但是揭露葡萄牙人販賣華工、虐待華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設置駐外領事，以國之外交手段保護海外華人群體，為華民在異國他鄉爭取政治地位和平等待遇的言論，也是國族意識在當代實踐的一種體現。鄭觀應所關注之“民”，不僅僅是天朝統治下的黎民百姓，還包括在異域謀生的僑

<sup>①</sup>有關研究參閱黃松贊：〈試論新、馬華僑社會的形成和歷史分期〉，廣東華僑歷史學會編：《華僑論文集》第一輯，1982年，頁75；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為例》，台北：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年，頁22—24。

<sup>②</sup>趙志海、劉華明主編：《中華辭海》第三冊，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2001年，頁2415。

<sup>③</sup>鄭振鐸編：《晚清文選》卷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88。

<sup>④</sup>[清]鄭觀應：〈南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008。

<sup>⑤</sup>《羅浮倚鶴山人詩草》，係己酉本所贈，見[清]鄭觀應：〈南遊同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6。

<sup>⑥</sup>[清]鄭觀應：〈書抵制美國禁華人入口〉，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78。

民、僑商、華工等，其“民”之範疇已體現出以國家觀念為基礎的理念，還體現在他對台灣問題、以及對台灣人民生活境遇的關注。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政府將台灣割讓與日本，雖然朝野上下都進行了反對“割台”的運動，甚至引發了“公車上書”事件，但是由於清政府的軟弱與一意孤行，反割台運動失敗。面對台灣的淪陷，無數晚清志士都表達了悲慟的心情，鄭觀應在〈乙未元旦作〉一詩中慨歎道“淮勇羞降敵，台灣恨屬人”，<sup>①</sup>對台灣失地發出“憤世獨悲辛”的長歎。

同時，鄭觀應對海外華人的認識又是全面與冷靜的。光緒十年（1884），鄭觀應奉命前往南洋一帶籌劃聯暹抗法一事，在《南遊日記》中記載了他在當地與新加坡華商的談話：“同舟者排坐，互相問答，均屬英籍華商。余此來，欲勸南洋華商急公好義，出奇制勝。無如富者皆入英籍數世，不思故鄉，間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未能遂成志願，掃此妖氛，憤懣不已。”<sup>②</sup>面對新加坡華商逐漸本土化和西化，以致與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隔閡日漸加深、不熱心中國政治的態度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可以說，近代國族意識不僅使國人關注現實中的南洋華人華僑問題，也啟發了對南洋地區戰略問題的思考，即強調領土主權對現實政治和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鄭觀應對南洋問題、海外華人群體所創作的敘事詩，是國族意識在傳統詩歌上的體現。

### 三、映照時代的“詩史”精神

“詩史”一詞，最早見於唐人孟棻用於對杜甫詩的評述，出現於所撰的〈本事詩〉中：“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sup>③</sup>至宋代，在《宋詩鈔》中“詩史”也是反映時代、記敘史實的詩篇：“詩多紀國亡北徙事，與文丞相獄中倡和作，周詳惻愴，人謂之詩史。”<sup>④</sup>“詩史”之說，不僅是對杜甫詩歌“善陳時事，律切精深”的高度評價，<sup>⑤</sup>也可以看成是對我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傳統的明確肯定。因此，所謂“詩史”，一方面，強調了詩歌創作中記錄歷史事件的寫實手法，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則體現了詩人試圖勾勒出“一代興替之變”的歷史場景，<sup>⑥</sup>並在其中表達個體意志的創作特徵。晚清民初的詩歌創作繼承並發揚了這種“詩史”精神，陳平原曾說：“在民族存亡的歷史轉折關頭，更容易產生太平年間所缺乏的悲壯情懷，一下子思接千古，自覺地把自己放到民族發展的鏈條中來考察，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深沉的歷史意識。不只是一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當前的變革，發一通興亡的感慨；而且秉筆直書，錄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使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sup>⑦</sup>

<sup>①</sup> [清]鄭觀應：〈乙未元旦作〉，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59。

<sup>②</sup> [清]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971。

<sup>③</sup> 張葆全、周滿江選註：《歷代詩話選註》，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1。

<sup>④</sup> 〈水雲詩鈔序〉，[清]吳之振等：《宋詩鈔》（卷一零五）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938。

<sup>⑤</sup> 〈杜甫傳贊〉，[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零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738。

<sup>⑥</sup> 鄧新躍：〈楊慎對杜詩“詩史說”的批評及其批評意義〉，《杜甫研究學刊》（成都），第1期（2005）。

<sup>⑦</sup>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98。

自覺記錄時代的“詩史”精神在鄭觀應的詩歌創作中尤為突出，不同於前人的是，鄭觀應的時代也是中國近代報紙刊物萌芽勃興的時代，維新志士們敏銳地意識到報刊輿論功能的重要性，期望以報刊這個有力的傳播媒介，傳遞信息、通達民情、開啟民智、立言議政。近代報刊的創辦，為鄭觀應的著述提供了有別於傳統著述活動的內容和條件。鄭觀應在 1870 年代積極向《申報》投稿，文章、詩歌頻頻見報，他於 1872 年年末輯成的《救時揭要》一書中就囊括了在《申報》刊發的 10 篇文章，這一著作使鄭觀應在 1870 年代中期以後在上海的紳商社會嶄露頭角，獲得了相當的聲譽。易惠莉曾在《鄭觀應評傳》中這樣評價鄭觀應早期的著述活動：一是輯《道言精義》……，二是輯《陶齋志果》……，三是輯《救時揭要》。前兩者屬於傳統的鄉土文化範圍，而《救時揭要》則是“觸景傷時，略陳利弊”的作品，與社會現實有着密切的聯繫。<sup>①</sup>從中可以看出鄭觀應對報刊社會力量的認識，後續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反映中國的國情、社會環境的詩歌。如，在《申報》上曾發表了〈有感〉、〈俠客行〉、〈喜晤甚陽先生兼懷隨緣子四律〉、〈美國前總統遊歷申江，於閏月二十九夕，租界遍設燈火並出水龍勝會，詩以紀盛〉、〈粵東水患甚於上年，書此志感寄望炊主人〉等，其中既有反映鄭觀應與道教人士交往具體側面的詩歌，也有記述美國第十八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卸任後與妻子遊歷上海的景象，還有記述廣東遭受水災，抒發憂國憂民思想感情的詩歌。晚年還曾在《慈善報》發表〈大舞台曲〉，在《益世報》（天津版）上發表〈由滬返粵感賦〉等詩歌，這些詩歌為深入研究鄭觀應思想的演變，乃至論析晚清思想的走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價值。這些詩歌由於刊發於報刊，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可以說是新世代“詩史”精神延續的一種表現。

鄭觀應誕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的當年（1842），此後在他人生的八十年間還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戰爭、中法戰爭、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反袁運動、鐵路風潮等，鄭觀應的人生與中國最跌宕起伏的時期交織在一起，政治上的風起雲湧，國際上的內外交困，無不反映在鄭觀應的詩歌創作中。

他的〈五十自述〉、〈鐵廠歌〉、〈開礦謠〉、〈商務歎〉、〈陸礦歌〉等詩作，可以說是他參與商戰的實錄；而在〈庚申己未兩歲秋感〉、〈聞大東溝戰事感作〉、〈拳匪〉等詩作中又瀰漫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等戰火的硝煙；還有為建構國族意識，用歷史書寫來凝聚國族認同的〈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憤世〉、〈哀黃人〉等詩篇；在〈水陸師學堂各藝大書院博物會機器製造廠棲流工作所皆富強始基急宜創辦賦此志感〉、〈答黃幼農、黃花農、蔡毅若、岑馥莊觀察論時事〉、〈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中日在滬共設各種書院〉等詩作中，論證了實業、教育、道德、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提出“蓋憲法乃國家之基礎，道德為學問之根柢，學校為人才之本源”的教育思想。<sup>②</sup>可以說，鄭觀應詩歌的題材範圍十分廣泛，涉及到實業振興、抵禦外辱、富強救國、國民教育等，詩歌中

<sup>①</sup>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56。

<sup>②</sup>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27。

所表達的進步意識，是近代敘事詩“詩史”精神。

在國運衰敗，列強緊逼的歷史背景下，晚清文人知識分子受亡國滅種危機意識的驅使，只得無奈把尋出路的眼光投向中國以外更加廣闊的世界。詩歌題材中還出現了外國史實與國際時事。當然，書寫異國事件的出發點是以他國的“亡國慘史”為國人的參照，成為同樣處於民族危機中的中國的“殷鑑”，而他國的“衰而復興”的歷史則可以成為中國效法的“榜樣”。<sup>①</sup>如〈書憤〉一詩中寫道：“保護蹈波蘭，獅熊非我族。”<sup>②</sup>〈憤世〉中又提出：“否則繼波蘭，禍至悔無已。”<sup>③</sup>在〈南洋〉一詩中還說“南洋島嶼似星羅，聞屬荷蘭地最多”。<sup>④</sup>鄭觀應通過對波蘭亡國的歷史、以及被荷蘭殖民的南洋地區的政治現狀的瞭解，表達出自己對於本民族可能步他人之後塵的隱隱擔憂。

在關注波蘭、印度、南洋小國多舛命運的同時，也關注身邊那些以維新而崛起的國家與復興。關於立憲問題，藉土耳其的歷史沉淪來喚醒國人，他在〈與潘蘭史徵君論時事感懷得五絕二十六首〉中說“立憲不可遲，群雄虎視時。存亡在此舉，當軸漫狐疑”。<sup>⑤</sup>如不及時改制，就會像土耳其那樣沉淪，“是真立憲耶？假立憲耶？是真立憲，何拂逆民情？若是假立憲，不懼蹈土耳其之覆轍耶？”（〈與潘蘭史徵君感論時局書〉）<sup>⑥</sup>關於維新改良問題，他把目光投向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明治時期日本由於變法維新的成功，也曾被鄭觀應引為“復興”的榜樣。

在詩歌創作的語言上，鄭觀應主張“力掃靡詞”、“尤顯貴淺”。<sup>⑦</sup>戊戌變法前由梁啟超等人提出的“詩界革命”，提倡“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其中一個創作主張就是在傳統詩歌的形式下，以新名詞、新事物入詩。鄭觀應的詩歌創作就充分踐行了這一理念主張，鄭觀應在詩歌中展現出豐富的新名詞、新事物。如“飛郵挾雷電，織軌走星虹”中的飛郵和織軌分別指電報和火車。<sup>⑧</sup>“激輪飛電收權利，織霧開山救困貧”中的激輪、飛電、織霧、開山分別指鄭觀應親自經營的四項企業：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開平採礦局。<sup>⑨</sup>除了政治、經濟、科技方面的新名詞，詩作中還常常出現英文音譯，在〈五十自述〉一詩“德律風傳百里音，電桿線捷飛輪駛”中所提到的“德律風”，<sup>⑩</sup>即 telephone（電話）的音譯。若從中國古典詩歌審美的角度考量，這些代表着新鮮事物的名詞確實缺乏古典詩歌所需的意境美，

<sup>①</sup>沈從文：《中國舊體敘事詩之新變（1840—1940）》，博士論文，復旦大學，2010年，頁88。

<sup>②</sup>[清]鄭觀應：〈書憤〉，劉崇敬譯註：《早期改良思想家詩文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頁231。

<sup>③</sup>[清]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2。

<sup>④</sup>[清]鄭觀應：〈南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008。

<sup>⑤</sup>[清]鄭觀應：〈與潘蘭史徵君論時事感懷得五絕二十六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92。

<sup>⑥</sup>[清]鄭觀應：〈與潘蘭史徵君感論時局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04。

<sup>⑦</sup>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494。

<sup>⑧</sup>[清]鄭觀應：〈上禮部尚書孫燮臣師四十韻〉，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95。

<sup>⑨</sup>[清]鄭觀應：〈上合肥傅相七排四十二韻〉，轉引自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2期（1999）。

<sup>⑩</sup>[清]鄭觀應：〈五十自述〉，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647。

而顯得過於直白質樸無文了，但是這種貼近現實的語言，又最能引發讀者共鳴，具有了激發國人奮進的力量。

鄭觀應號“杞憂生”，在他的詩作中常常將“杞憂生”的寓意與詩歌的創作結合在一起，“杞人有淚憂天墜”（〈無題〉），<sup>①</sup>“吾儕深抱杞人憂”（〈亞細亞協會歌〉），<sup>②</sup>“仰天獨抱杞人憂”（〈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領事論時事作歌並序〉）等，<sup>③</sup>鄭觀應在書寫歷史事件、對歷史事件進行評述的同時，還表達了自己作為歷史參與者的自身感受，使這些詩歌讀來更加親切，具有了情感的穿透力。

鄭觀應自言其詩是“隨手寫錄”，在《羅浮侍鶴山人詩草》己酉本的自序中說：“惟於家國之事傷心慘目……往往夢寐不安，為之行愁作歎。……故自忘鄙俚，復隨手寫錄，幾不成韻語，或五言，或七言，寓意規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見唐虞盛世。”<sup>④</sup>南社四劍之一的潘飛聲讚譽他“詩中陳同甫”，<sup>⑤</sup>長沙蕭榮爵評價他的詩歌是“傷亂每編王祭句，感時常寫杜陵篇”。<sup>⑥</sup>將鄭詩與王祭、杜甫的詩篇並提，這與鄭觀應自述的“憂國新詩懷杜甫”詩論主張相一致。<sup>⑦</sup>鄭觀應以詩歌為載體，記錄了他所生活時代的一個個歷史場景，不僅反映時代變遷，還反映了他對社會發展的認識歷程，為中國舊體詩歌延續千年的“詩史”傳統增添了新的內容。

鄭觀應踐行了“以議論為詩，直紀時事”、“心有所感，信筆賦之”的詩歌創作主張，<sup>⑧</sup>在題材上包攬了述志感物、實業振興、時事維新、禦辱抗侵、修身風物等內容。從題材的選擇來看，鄭觀應審視到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題材範圍的廣泛，體現了他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與政治環境的敏銳觸覺，貫穿着愛國禦辱、立憲變政、實業救國的主題。這些貫穿在鄭觀應一生中的詩歌，不僅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鄭觀應思想的多面性，也反映了他思想的演變歷程，乃至晚清思想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鄭觀應的詩作，特別是他的創作中被較多關注的實業詩，可以說是對中國近代創業歷史艱辛歷程的側寫，這就為傳統文學與史學觀念之間的融通、互證提供了史料基礎，也為開闢“詩史互證”、“詩文相佐”的研究方式提供了新的路徑。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 校對 黃耀岷 葛家傑 ]

<sup>①</sup> [清] 鄭觀應：〈無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5。

<sup>②</sup> [清] 鄭觀應：〈亞細亞協會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12。

<sup>③</sup> [清] 鄭觀應：〈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領事論時事作歌並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06。

<sup>④</sup> 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46。

<sup>⑤</sup> 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卷二，上海：上海廣益書局，頁9。

<sup>⑥</sup> [清] 蕭榮爵：〈羅浮侍鶴山人詩草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0。

<sup>⑦</sup> 李文初：〈如何評價鄭觀應的詩歌〉，《嶺南文史》（廣州），第1期（2003）。

<sup>⑧</sup> [清] 鄭觀應：〈羅浮侍鶴山人詩草自序〉，《羅浮侍鶴山人詩草》，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550。